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与郑鼎关系略考^{*}

华 喆 李鸣飞

内容摘要:《析城郑氏重校三礼图》是聂崇义《三礼图》在蒙古时期刊刻的一个重要版本。以往学者认为此书刊刻于河南地区,刊刻者不详。今考证,此书的刊刻者当为郑鼎。郑鼎出身于山西阳城郑氏家族,所谓“析城”即指阳城县名胜析城山,故此书刊刻地点应在山西。

关键词:《三礼图》 郑鼎 山西刻本

公元 1234 年,窝阔台汗依照成吉思汗遗策,命塔察儿、史天泽、张柔与南宋联兵灭金,终结了自靖康之变以来金朝对中国北方百馀年的控制。受多年蒙金交战的摧残,加上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文化较之金人远为隔膜,蒙古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事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官方出版业基本停滞,政府不再以国家力量支持书籍刊刻出版。幸而民间私人刻书仍在进行。关于蒙古国及元朝出版业的概况,陈高华先生已经做过鸟瞰式的研究^①。据陈高华先生的介绍,金朝统治时期,燕京和平阳是当时书籍刊刻的两大重镇,金灭之后,这两个地区的私人刻书仍然活跃。姚枢和耶律楚材先后在燕京主持刊刻书籍,全真道更于 1244 年在平阳完成了《玄都宝藏》的刊刻,工程规模巨大,堪称一时无二。平阳张氏晦明轩也重新出版了如《经史政类备用本草》等各类书籍。除去燕京与平阳两地以外,其他地区也有私人出版的图书值得注意,本文所要讨论的《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即为其中之一。

《三礼图》具有久远的学术传统。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 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 2013 年自主科研项目“蒙元时代的出版文化”(105564GK)阶段性成果。

^① 陈高华:《元代出版史概述》,《历史教学》2004 年第 11 期,第 13 页。

等目录记载,《三礼图》先后有郑玄、阮湛、夏侯伏朗、张镒等图问世^①,今天均告亡佚。北宋建隆三年(962),聂崇义采《三礼》旧图,奏上《三礼图》一书,成为今天所见最早,同时也是最为完备的一部《三礼图》。《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即是聂崇义《三礼图》的传世刊本中的一种。这一刊本曾经明末大藏书家毛晋收藏,后辗转归入清末蒋汝藻传书堂。蒋汝藻藏书散出后,此书被张元济购得,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影印行世,广为学人所知。

关于《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的出版经过,此书篇末有“长南阳山昌元王履”跋一则:

《三礼图》余袭藏久矣,尝欲刊之梓,与同志共之,家贫未之能也。中间辽东唐括师皋为置书版矣,工费犹无从出也。丙午夏,余以涪翁《易》、文定公《春秋》传授诸生于葛庐。时潞城王贡文举暨濮阳聂君天佐来过,听讲毕,偶及是图,文举曰:“无它求,郑侯归,当为先生成之。”余应曰:“诺。”然亦未必其言之讎也。未几,文举不幸不起,余哭之馆中。后数月,郑侯北还,次日过余衡茅,共话文举,惘悼久之。又次日,乃遣其客于寅子佳来,曰:“君所欲刊之书何在?请命工计之。”余曰:“余与文举语时,郑侯在北也。郑侯归,文举已矣,此言何以达郑侯也?”子佳曰^②:“文举病中尝以此见属,郑侯归,问文举临歿时何所道,余以是告,故特遣某来。”余闻,不觉为之长叹焉。何则?文举,布衣士也;郑侯,国家大将军也。寒士临终之语,且传闻之辞,何足介胸次,乃拳拳如是!则文举平日所以取信于人,郑侯平日所以不忘乎旧,是可以观其故矣……虽然,郑侯武纬文经,勋名久当书史册,此固不足多道。而吾文举垂歿,切切斯文之意,子佳道旧,能成故交之心,则不可使之泯没于后世也。故特书是图后,使二人姓名与是图相为不朽云。次年季春朔旦,长南阳山昌元王履书于楚梓堂。^③

由此跋文可知,王履本人家藏一部聂氏《三礼图》,早有刊刻流布的打算,但因乏于资财,一直未能如愿。“丙午夏”,王履在讲授《易》及《春秋》时偶然提及此事,当时听讲诸生中有一位来自潞城县的王文举,提出可以代为联络“郑侯”助成此事。然而“郑侯”当时不在本地,王文举又染上急病,不幸去世。王履本以为刻书一事已化泡影,结果时隔数月,“郑侯”归来,在与王履一同缅怀王文举之后,知道了刻书一事,便遣人来找王履取书付梓,次年板成。这就是本书题为《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的由来。然而这篇序言中并无年号,内容中也没有透露出明显的时代特征,难以确定具体写作时间,故此毛晋、何焯等人均误以此书为宋本。至1920年代,王国维为蒋汝藻编写《传书堂藏善本书志》

①《隋书》卷三二,中华书局,1982年,第924页。《新唐书》卷五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1433页。

②按“佳”字处原阙一字,据文意补。

③王履:《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跋》,《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四部丛刊三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时才对此书进行了详细考订,认为王履讲学的“丙午”应当是蒙古定宗元年(1246),则此书当为定宗二年刊本。但对刊印此书的关键人物,也就是王履跋文中提到的“郑侯”,王国维指出“郑侯并不著其名”,“此称析城,盖即浙川人矣”,未能考出“郑侯”的确切身份^①。此后张元济为《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影印本撰写跋文时,基本沿袭了王国维的结论,认为“郑侯未知何人”。以下张元济又依照王国维的考订,认为“析城”当为河南邓州下辖淅川县,“疑郑侯即淅川人”,此书应刻于河南。由于《四部丛刊》的普及,张元济之说对后来学者影响甚大^②。可是王履在跋语中有“郑侯,国家大将军也”、“郑侯武纬文经,勋名久当书史册”等语,在蒙古时期,汉人能够有如此地位者并不多见,“郑侯”一定是当时的著名将领,才有可能得到如此评价。故此笔者查考蒙古时期的汉人将领,并结合“析城”这一地点,推测这位“郑侯”应当出身于泽州阳城县的郑氏家族,“析城”即泽州阳城县西南的析城山,“郑侯”极有可能是《元史》中有传,被宪宗蒙哥赐名“也可拔都”的郑鼎^③。

二

郑氏家族是金末蒙初河东泽州阳城县的望族。这一家族兴起于蒙古灭金之后的诸侯割据战争之中,其荣耀一直保持到元末红巾乱起之后。关于郑氏家族及其在元代长期率领的平阳太原万户府,刘晓有文章专门论述^④。与蒙元早期郑氏家族相关的碑传资料不少,除《元史·郑鼎传郑制宜传附》外,还有袁希耽为郑皋所写的《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郑皋神道碑》)^⑤,王磐为郑皋之子郑鼎所写的《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以下简称《郑鼎神道碑》)^⑥,以及袁桷为郑鼎之子郑制宜所写的《资德大夫大都留守领少府监事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知大都屯田事赠推忠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泽国公谥忠宣郑公行状》(以下简称《郑制宜行状》)^⑦。《郑鼎神

①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经部·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王国维先生遗书续编》第七册,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第2674页。

②如陈高华《元代出版史概述》一文提到丙午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认为析城属邓州,即今天河南邓州(《历史教学》2004年第11期,第13页)。

③《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635页。

④刘晓:《元镇守武昌“平阳太原万户府”考——以万户郑氏为中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9-540页。

⑤袁希耽:《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乾隆]阳城县志》卷十二《艺文》,清乾隆二十年(1755)阳城县署刻本。

⑥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五,明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

⑦袁桷:《资德大夫大都留守领少府监事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知大都屯田事赠推忠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泽国公谥忠宣郑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道碑》与《郑制宜行状》也是《元史》中郑鼎与郑制宜本传的史源。这三篇文字都说明郑氏出自泽州阳城县。但由于郑氏在蒙元初期以军功起家,其家庭成员后来大多担任军中要职,因此除《郑皋神道碑》外,其他资料均未提及郑氏祖上曾为儒生。《郑皋神道碑》云:“大父邻生子三,曰盛夫、曰珪(按,即郑皋之父,郑鼎之祖父)、曰让,皆冠儒。越所居之第,别构一大堂,榜曰丽泽,以会朋友,讲习道义,岁无虚月,乡党倾慕焉。”^①据此可知,郑皋的父辈兄弟三人均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家中有一丽泽堂,专门作为聚众讲习学问之地。丽泽堂之名出自《易·兑卦》“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或即后来所谓“析城郑氏家塾”的前身也未可知。

郑氏一族由书香门第向军功世家的转型发生在郑皋一代。金末战乱中,华北之地,群雄割据,泽州属于上党公张开的势力范围,郑皋即组织了一批武装力量投靠张开。《金史》记载金末“封建公府以固屏翰……升泽、沁二州为节镇”^②,以泽州为忠昌军。郑皋为泽州人,因此被封为忠昌军节度使同知。张开与蒙军交战兵败后,郑皋归顺木华黎,升为忠昌军节度使。郑皋卒于1228年,遗下三子。长子郑鼎继承父业,于弱冠之年任泽潞沁千户,并屡次随蒙古大军南北征战,据《元史·郑鼎传》“岁甲午(1234),从塔海绀不征蜀……乙巳(1245),迁阳城县军民长官。庚戌(1250),从宪宗征大理国”^③。次子郑庭瑞于世祖中统三年(1262)充平阳太原新军千户,后升为万户^④。三子郑甫为文官,曾任阳城县令^⑤。后来平阳太原万户一直由郑氏家族专任,后长驻湖北鄂州一带,直到元末至正年间还曾起用当时的“郑万户”来对抗红巾军,堪称河东地区汉人军功世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⑥。

三

由于王履把“郑侯”称为“国家大将军”,又说他“武纬文经,勋名久当书史册”,再加上与“郑侯”相熟的王文举来自距泽州不远的潞城县,因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郑侯”就是阳城郑氏这个著名军事家族中的一员。从时间上来看,最符合王履跋文中“郑侯”者,在郑氏家族之中只有郑鼎一人。根据前述王履跋语,他在丙午年即蒙古定宗元年(1246)遇到王文举,遂有“郑侯”出资刻书一事。此时郑鼎之父郑皋已经去世,郑鼎二弟郑庭瑞直到忽必烈上台之后的中统三年(1262)才得到宣命,充平阳太原新军千户,最起码在定

①袁希耽:《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

②《金史》卷一一八《张开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0页。

③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

④袁希耽:《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

⑤袁希耽:《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

⑥刘晓:《元镇守武昌“平阳太原万户府”考——以万户郑氏为中心》。

宗二年以前尚未有值得一提的功勋,更不必说“国家大将军”的身份^①。反观郑鼎履历,他于弱冠之年就已担任泽潞辽沁千户,并在1234年随蒙军出征四川。1245年,郑鼎回到家乡,任阳城县军民长官,正好在王履、王文举谋划刻印《三礼图》的前一年。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又是管军千户,故此王履以“国家大将军”、“郑侯”称之,当然没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郑鼎本人虽然成长在战争环境之中,但其人绝非一单纯的武夫而已。除了郑氏家族本身具有一定儒学背景以外,郑鼎的母亲刘氏是“进士刘资之女”,也出身于书香门第^②。《郑鼎神道碑》中提到他曾“入乡校读书”,《元史》本传则说他“读书晓大义”^③,《赠中书右丞郑鼎制》更是称赞他“伟略雄才,清流宿望。书通六籍,惟不肆以不矜;剑学万人,亦能仁而能勇”^④。由此可见,王履在跋语中称赞他“武纬文经”,虽然不无夸张,但也绝非无中生有的谀辞。《郑鼎神道碑》记载他在至元初年担任平阳路总管时曾“修潞州学舍以振起文风”^⑤,可见他对文化事业也比较热心。以往学者关于郑鼎和郑氏家族的文章很少提及郑氏的儒学传统和郑鼎对文化事业的关注,从其传记资料与《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来看,郑鼎与儒生之间有着比较好的私人关系。结合《元史·郑鼎传》和王履跋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1246年定宗即位,阳城县军民长官郑鼎大概因此北上。此时王文举向南阳山长王履允诺促成刻书一事。等郑鼎回来,王文举已经不幸去世。郑鼎听说此事后,为了完成好友的遗愿,从王履处取书刊刻。次年板成后,由王履作跋,题名为《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这应当是此书出版的全部经过。

四

既然这位“郑侯”在《元史》中有传,那么王国维、张元济又怎么会考不出他的确切身份呢?说起来很有意思,王国维一上来就把考证的大方向弄错了,导致后来学者都跟着他一起误入歧途,自然没办法想到郑鼎头上来。王国维对这一问题的考证如下:

此书为王履所刊,而郑侯助以刻资,故题“析城郑氏家塾重校”。王履不知何时人,郑侯并不著其名。履自讲《易》及《春秋》于葛庐,葛庐谓南阳诸葛草庐,又自署“长南阳山”,盖南阳书院山长也。析城亦在南阳,其地本汉弘农郡析县,金时置淅川县,属邓州,后并入内乡。《元史·地理志》谓元初所并,然《金史·地理志》邓州无淅川县,盖金末已废。此称析城,盖

①袁希耽:《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

②袁希耽:《元故忠昌军节度使郑公神道碑铭》。

③《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第3635页。

④《[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一。

⑤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

即浙川人矣。至刊此书之年,后序但书丙午之次年而无年号,盖蒙古定宗二年,当宋理宗淳祐七年。下距世祖中统纪元尚十三年,时犹未立年号。往读程雪楼《南阳书院碑》云:“至大初始建庙学,皇庆元年落成,置山长一人,名曰南阳书院。”跋此书之王履为南阳山长,则此书似刊于皇庆之后。然皇庆后丁未乃元亡之年,此书字迹决非元明间刊本,其可定为定宗二年刊者,盖太、定二宗时正值金亡之后,金唐、邓诸州始为宋有,旋入蒙古,蒙古又屡寇蜀地,故王履以蜀人长南阳山,盖蒙古之俘虏也。《宋史·孟珙传》载珙奏“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郢渚。臣作公安、南阳两书院,以没入田廬隶之,使有所教养”。此事在宋淳祐五年,即蒙古定宗即位之前一年。盖金时邓州故有南阳书院,宋人因之,及地入于蒙古,孟珙乃设之于郢口,以居襄、邓之士。其实此时蒙古之邓州亦有此书院也,元初中废,程雪楼之记乃误以复旧为创始耳。^①

王国维对于王履及南阳书院的相关考证非常精彩,但是他认为析城就是南阳附近的浙川却有些问题。汉代虽然在此曾设有析县,但在北魏以后已改名浙川。《金史·地理志》中邓州下属三县六镇之中并无浙川之名^②,可知金朝后期至蒙古时期,浙川很可能已经与其他县合并。此书题作“析城郑氏”,析城不大可能是浙川的别称。实际上,泽州阳城县西南有析城山,在《尚书·禹贡》中已有记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③《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析城山在潞泽西南”^④,潞泽即阳城县古名,唐天宝元年(742)改称阳城^⑤,金、元依然沿用。析城山有一汤王池,旧有商汤在此祈雨的传说,北宋曾在析城山修建商汤庙。据李俊民《阳城县重修圣王庙记》所载,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河东路旱,通判王伾在此祈雨有验,嗣后朝廷封析城山神为诚应侯。徽宗政和六年(1116)三月赐庙额“广渊之庙”,并进封嘉润公。宣和七年(1125),县民在县治所修成汤庙,作为社祀之所,庙中供奉析城山神^⑥。该庙于元初重修,主持者即郑鼎的幼弟郑甫^⑦。由于析城山是阳城县最为重要的名胜,作为泽州阳城县人的郑鼎自称为析城郑氏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王国维却因为王履“长南阳山”,理所当然地把葛庐解为诸葛草庐,于是认为此事应当发生在南阳一带,才有“此称析城,盖即浙川人矣”的结论,这样就排除了“郑侯”为郑鼎的可能。张元济以下学者均受王国维这条考证的影响,只是在河南浙川寻找符合“郑侯”条件

①王国维:《传书堂善本书志·经部·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第2674-2676页。

②《金史》卷二五,第592页。

③《尚书正义》卷六《禹贡》,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7页。

④《汉书》卷二八上,中华书局,1964年,第1533页。

⑤《旧唐书》卷三九《志·地理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8页。

⑥李俊民:《庄靖集》卷八《阳城县重修圣王庙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李良:《大元泽州阳城县新修成汤东庙记》,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刻本。

的人,自然无法找到,还把本来在山西刻板的书认作河南地区的刻本。实际我们只要把王履跋语同郑鼎的相关资料放在一起对比,就不难确定“郑侯”的真实身份了。

五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过《郑鼎神道碑》与《元史·郑鼎传》可以解决《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王履跋语中的若干疑问。同样的,王履跋语也能帮助厘清《郑鼎神道碑》和《元史·郑鼎传》中对郑鼎早期生平记载中的一处小小混乱。据《郑鼎神道碑》:

(郑鼎)随逐塔海绀不出军,攻取二里、散关、凤翔、褒斜、兴元、剑阁、成都、重庆等处军,还留驻秦中。寻有宋将余侍郎烧毁栈道,以兵围兴元,公引领军为重修栈道,救应兴元,至汉山破走南军,解兴元之围。庚戌岁(1250)扈从今上征大理国。^①

《元史·郑鼎传》则称:

岁甲午,从塔海绀不征蜀,攻二里、散关,屡立战功,还屯秦中。未几,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兵围兴元,鼎率众修复之,破宋兵,解兴元之围。

乙巳(1246),迁阳城县军民长官。庚戌,从宪宗征大理国。^②

《元史》本传明显是根据《郑鼎神道碑》编写,但多出“乙巳,迁阳城县军民长官”一句。虽然不知道本传据何补充,但从上引王履跋语来看,本传多出的这一句是符合事实的。也正因为郑鼎此时担任阳县长官,才有刻书付梓的条件。

然而《神道碑》记载简略,把攻蜀与解兴元之围记为一事,使《元史》的编纂者把郑鼎在乙巳年担任阳县长官之事系于“解兴元之围”后,产生了时间上的错误。实际上蒙古在四川地区的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蒙古进攻,从1234年(南宋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塔海绀卜(又作达海绀卜)征蜀开始,此后1235年阔端太子率领主力军队攻略秦巩,随后大举攻蜀^③,至1236年十月攻下成都为止。此役之后阔端即率主力军队北返,留下部分军队继续攻掠。第二阶段为蒙宋相持,蒙军连年入蜀抢掠,试图渡过长江打开川东大门,但均未成功,“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因此夹谷忙古带于1237年建言

①王磐:《元中书右丞谥忠毅郑公神道碑》。此处“庚申岁”有误,应以同篇《神道碑》后文所载“壬子岁,扈从今上西征大理”为是。

②《元史》卷一五四,第3635页,此处“庚戌,从宪宗征大理国”有误,应为“壬子,从世祖征大理国”。按《元史·世祖纪》所载,忽必烈于壬子年六月“奉命帅师征云南”并于当年“秋七月丙午,谕牙西行”,而军队进入云南则在癸丑(《元史》卷四,第58-59页)。因此《蒙兀儿史记》将此处“庚戌”改为“癸丑”(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九十四《郑鼎列传》,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第610页)。

③《元史》卷二《太宗纪》,第34-35页。

在兴元屯田,制书同意都元帅“量留汉军……无时籍数”^①。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蒙古四道攻蜀为余玠所阻。定宗即位后,下令设置兴元行省^②,准备进行长期战争。第三阶段为南宋反击,余玠于1250年冬(南宋淳祐十一年,蒙古宪宗元年)北攻,1251年烧毁栈道,包围兴元^③。各路蒙军驰援,郑鼎率军修复栈道,解兴元之围^④。此年宪宗蒙哥即位,随后改变了攻蜀策略,并且由忽必烈实行斡腹之谋,准备进攻云南打通攻宋道路。1251年的兴元之战后,宪宗曾叙劳封赏,郑鼎修复栈道,功劳卓著,此后离开四川战场,跟随忽必烈出征云南。也就是说,郑鼎全程参与了蒙元时期的蜀地作战,他不仅经历了第一与第三阶段的主要战役,而且还曾在第二阶段中一度留驻兴元屯田。由于蒙军与宋军在蜀爆发两次大规模战斗,前后有十餘年的时间差距,而神道碑的记载使人容易认为两次作战为先后发生,导致《元史》发生了编排上的错误。因此《元史·郑鼎传》中“乙巳(1245),迁阳城县军民长官”一句应提至“未几,宋将余侍郎烧绝栈道”以前,因为余玠围兴元事在辛亥,不当排在乙巳年之前。郑鼎大概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后留驻兴元屯田,不久被任命为阳城县军民长官,在任期间刊刻了《三礼图》一书。当余玠北攻兴元时,他又回到战场,并解兴元之围。

《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中的“郑侯”身份固然有待史传资料来考明,而有关“郑侯”的史传资料也可通过《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来证其可信,史学与版本学之间可以互相发明,本书即为一例。

【作者简介】华喆,男,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李鸣飞,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元史。

①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

③《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四“淳祐十年十月辛巳”、“淳祐十一年六月甲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元刻本,1980年。

④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王磐:《元中书右丞溢忠毅郑公神道碑》。